

科技向善的反思

——评《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

贾梦真^{*}

摘要:人类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为社会带来了挑战。《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从科技公司内部视角反思科技使用的结果,提出科技管理创新要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呼吁公共部门和科技公司加强合作。其中,该书提出系统性短视和监管的缺位是科技成为武器的系统性制度因素,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监管缺位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将书中观点置于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展开讨论,反思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消除技术异化。

关键词:科技向善 管理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

《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问题》(以下简称《工具还是武器?》)是由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卡罗尔·布朗(Carol Browne)合作撰写的,该书从科技公司的案例视角对人类使用科技的方式进行了反思,主题涵盖了网络安全信息技术、隐私权等当下的热门话题,并从科技公司的角度为“科技向善”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不断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建设^①,但是科技公司作为行动主体的反思性仍有欠缺,特别是科技公司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伦理问题。为了实现科技治理中制度规范和自我约束的协同共治,我们必须重视科技公司在科技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学术界往往将科技公司视为研究对象,该书以科技公司的内部视角为我们呈现了科技公司在面对伦理难题时具体的博弈过程,为我国推动“科技

^{*} 贾梦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①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

向善”相关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支撑。

本文的结构如下:(1)对该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梳理,梳理出该书的关键线索,对题目中所提出的“工具论”和“武器论”进行解读,将这对概念中蕴含的辩证法作为思考当前人类技术发展的一个切入点;(2)回顾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并对书中“为何科技会成为武器”的相关观点展开论述;(3)从行动方面,针对微软的行动方案梳理科技公司和公共部门加强合作的行动前景。

一、本书主要内容

该书有着清晰的“分总”结构,作者在前5章主要论述了数字技术给全球局势带来的重大问题,论及科技在一种监管缺位的状态下给民主制度、个人权利、社会极化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第6~15章中主要从行动的角度出发,作者从微软这一行业带头人的行动轨迹中反思技术带来的局限性和行动的愿景。行动轨迹涉及维护民主制度、隐私权利、性别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数据开放等诸多方面。作者在第16章使用了“技术强度”(tech intensity)概念,用以表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渗透程度,以此总结当前数字技术的问题根源在于数字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的反思速度,并指出科技公司和公共部门应该保持理性,增强组织力,以更好地驾驶这艘科技大船。综合该书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所论及的案例无一不体现数字时代的反思精神,其反思的主要内容是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并且避免技术作恶。

《工具还是武器?》一书在题目中就指出科技在当下的角色,“工具—武器”的对立就是该书对当下科技的诠释,作者在文中坦言“数字技术已经兼具工具和武器的两面性”。例如,微软有大量来自执法部门调取用户信息的申请(电子搜查令),甚至有的部门发布封口令,禁止微软将搜查告知客户。微软面临两难困境,数据一方面是破解案件的关键证据,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破坏用户隐私权的武器。为了平衡隐私和安全,坚持数字中立性,微软通过司法流程对封口令提出异议,并推动立法,最终司法部限定封口令只能在必要和特定的时间段内使用,禁止滥用。该书通过诸多类似的案例,呈现科技的工具属性和武器属性的张力,为我们揭示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可能性和威胁。

工具或者武器并非客观事物,而是被人所塑造的主观之物:工具(tools)指的是一种可以扩展个人修改周围环境特征或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的物体;武器(weapons)指的则是任何可以用来威慑、威胁、造成物理伤害、进行伤害或杀戮的工具或装置。由定义可以看出,工具与武器是一体两面的,工具之中蕴含着成为武器的可能性,武器在本质上属于工具。虽然工具和武器都是客观的物体,但是其价值向度是不同的,工具之所以成为工具是因为其有使用价值,而武器之所以成为武器则是由于被滥用,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客观的物体,其使用方式不同,那么工具和武器之间就会相互转换。

技术中立性在学术界有诸多讨论:一方认为,技术并不总是一种中性的手段,比如技术的非人道性应用;另一方认为,技术就其本性来说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它只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因而技术是中性的。有学者认为,前一种观点错在区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运用(刘文海,1994)。该书也基本认同技术中立性,例如针对人脸识别的“性别阴影”(gender shades)^①问题,作者认为如果不建立起反映世界多样性的团队,就很难建立服务于世界的技术(史密斯、布朗,2020)。从价值层面来看,技术本质上是中性的,而技术成为工具还是武器只是技术使用的结果,技术如何被使用则是社会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它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刘文海,1994)。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言:“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对于自己来说,既没有什么善,也没有什么恶,一切都取决于人;技术对于如何利用它是漠不关心的。”(雅思贝尔斯,2013:172)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针对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对理论进行梳理。

二、现代性话语下的科技反思

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科学技术高歌猛进;与此同时,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反思对象。在人类对科技前景持有无限乐观态度时,不可忽视的是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催生了技术批判思潮的繁荣。正如该书所说:“在我们不断努力为人类带来更多科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为科

^① 指人工智能的偏见现象,与白人相比,人工智能在识别黑人性别方面错误率更高。

技注入更多的人性。”(史密斯、布朗,2020:294)科学技术是伴随着现代化过程兴起的,因此有必要将科技置于现代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接下来,我们将梳理思想家在现代性语境中对科技的反思,然后进一步探讨书中“为何科技会成为武器”的相关观点。

(一)从韦伯的“诸神之争”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韦伯(Max Weber)将科技的发展置于现代社会之中,他从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角度指出,世界经历了“祛魅”之后,科学理性战胜了宗教理性。在传统社会,宗教价值观统治的世界有统一而完整的秩序;随着宗教价值观被科学主义取代,社会思想失去其统一性,呈现出“诸神之争”的局面,真善美分离,多元价值观出现(韦伯,2010)。科学理性只能回答真实性的问题,并不能回答“善”和“美”的问题。科技发展不断地服务于科学理性的效用逻辑,而往往忽视道德伦理。

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科技,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也曾对科技带来的异化进行反思。他将道德破坏视作技术进步的代价,再次将技术和道德伦理置于对立面: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越加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1972:3)

继承了技术与道德对立的理论脉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社会和技术进行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诊断。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科学及其危机的札记》与《启蒙辩证法》中,对科学技术批判具有全面的表述。他指出,科学技术的非理性特征和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当面临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总会逃避它的责任”,以及“技术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霍克海默,1989:5)。在霍克海默看来,科学技术的

发展并没有带来启蒙精神所倡导的光明前景,反而是技术逐渐掌握了自主的力量,成为控制人类的威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技术发展有更加强烈的批判,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的奴役。”他在破除关于科学技术“中立”的逻辑起点上,论证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在“愈加高效地开发自然和精神资源”的同时,日益使人进入“渐进的奴役”之中,表现为人性的丧失,人成为工具、成为“单向度的人”(Marcuse,1964)。

沿着技术批判的传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了直接批判,另一方面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出发对整个社会做出诊断。首先,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指出,国家通过掌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有了统治合法性的功能(哈贝马斯,1999)。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民众失去了政治性,通过将政治问题包装成技术问题,使广大民众失去了对公共领域的关注,科学技术最终上升为一种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并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蔡曙山,2002)。其次,通过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以技术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发展不断影响生活世界,破坏了生活世界原有的自由、平等观念。

与将技术视作器物的传统观点不同,埃吕尔(Jacques Ellul)将技术视为技术系统,对技术整体进行反思。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变革,从古希腊到20世纪中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邱泽奇,2018)。技术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成为无处不在的工具(means),即技术泛在化(technical universalism),成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同等意义的技术环境(刘电光、王前,2009),并提出了“技术化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命题(Ellul,1964)。

在现代性反思的视角下,技术和道德总是被置于对立的两面。但是也不可否认,技术已经进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下的科技发展是系统世界前进的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工具还是武器?》一书延续了这种现代性反思的视角,从实例中展现了技术对道德的入侵,并且分析了科技从工具发展为武器的原因。

(二)科技为何成为武器

科技为了服务而生产,但在当下却发展出成为武器的隐患,该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提出,系统性的短视和监管的缺位是技术成为武器的制度因素。

首先,科技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短视。该书关注到,“科技公司的传统是会首先专注于开发令人兴奋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尽快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作者将此称为“闪电式扩张”。除此之外,它们通常很少有时间或精力关注其他方面(史密斯、布朗,2020)。并且,“由于科技多元化和竞争的商业模式,与其他许多行业相比,今天的科技行业往往四分五裂,甚至在行业协会和自愿行动方面也分歧多多”。这反映了科技发展本身的问题,科技进步和提高生产力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主宰的地位,并和财富生产的逻辑捆绑在一起,也因此难以产生有效的合作行为。当科技面临系统性的经济短视,由于其过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技术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子领域,科技公司也只关注自己的产品,便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正如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中讲道的:

科技好奇心的优先事项是为生产力服务,由此带来的危险则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因此,风险的生产及其受到的误判都源于科技理性的“经济短视”。科技理性眼中只有生产力优势,因而患上了受系统制约的风险失明症。人们对经济有益的机会加以预测、发展、检验,并娴熟地使之展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黑暗中伴着风险摸索前进。(贝克,2018:60)

其次,社会对技术发展的监管不足。该书反思当下对技术发展的严重监管缺位,几十年来,数字技术在几乎没有监管甚至自我监管的情况下取得了进步,我们期待这种科技进步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缺乏监管的科技发展却无法回应这种预期。国内学者也指出,科技作恶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邱泽奇,2018)。

作者指出监管缺位的两个原因。一方面,自启蒙时代以来,各国都对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信念深信不疑,科学论证被看作唯一权威的正当执行者。由于技术神话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神话,科学技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力,科技发展因此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也是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砝码。在此背景下,公有部门对技术不断增加支持,并且认为科技是安全的,不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制造了监管的壁垒。该书在第16章对全书提到的技术进行总结,用“技术强度”这个术语来描述科技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渗透,这与罗

莎(Hartmut Rosa)和特罗-马蒂斯(Jonathan Trejo-Mathys)关于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的观点类似,技术加速是时间结构现代性的表现之一(Rosa & Trejo-Mathys,2013)。在技术不断加速的时代,科技行业的关键矛盾是管理创新的速度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速度。国内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提出“异步困境”的概念: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阈值极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域,前沿部分早已进入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领域(邱泽奇,2018)。

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是大大地强化了监管的壁垒。在大数据时代,科技公司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出人工智能系统,利用算法工具实现自动化决策,让机器像人类一样从经验和数据中学习,进行一些替代人类的决策。这造成了科技公司内部算法的黑箱状态,提高了公共部门监管的难度。该书坦率地指出,当前参与监管的主体对其监管对象认识不够,就像华盛顿特区与硅谷之间隔了2500英里的地理鸿沟一样(史密斯、布朗,2020)。

同时,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监管的难度大大提升。在微软的经验中,政府监视领域的变革、网络安全保障、隐私保护都是需要全球努力的方向,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巨大阻力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很难看到政府在科技方面团结协监管。

三、重塑科技向善的动力

技术创新的脚步不会放缓,管理创新的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贝克警示了科技无序发展的后果:“疾驰中的科技发展‘无人掌舵’,并释放出爆炸性力量,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发展的自我理解和政治样态,为它装上刹车和方向盘。”(贝克,2018:228)汽车在20世纪初发明时是没有安全带的,随着无数次交通事故的发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强制司机系上安全带的法规,当下我们面临的科技风险正是缺少一条安全带。正如作者所讲,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不是源自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得过多,而是源自人们做得不够。这种风险也不是源自政府行动太快,而是源自它们没能及时行动(史密斯、布朗,2020)。

在针对如何对待技术作恶的方式上,有学者对比消除技术异化的“三条道路”^①,认为只有通过完善社会建制、逐步消除技术异化才是可靠和有效的(刘文

① “三条道路”分别是指放弃技术避免异化、技术进步战胜异化和适宜技术。

海,1994),这与该书的观点一致。对科技的管理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事业,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监管的合力。从该书中可以看出,作者身处科技公司内部,对技术的使用具有控制权,并且认识到了科技公司的种种问题。即便如此,他们在推动问题解决方面也会处处掣肘,这意味着仅仅依靠科技公司主体的自律是无法完成监管的,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监管制度和科技公司的自律来实现。此外,科技公司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更应该保持对科技的反思,主动接受监管,推动完善科技治理法律法规,使得“科技向善”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更重要的是,面对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公司更应该通力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整合各方利益,推动科技领域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只有如此,才能推动科技向善,使得科技在21世纪开出绚烂之花。

参考文献

- 史密斯,布拉德·卡罗尔·布朗,2020,《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杨静娴、赵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蔡曙山,2002,《论技术行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哈贝马斯,尤尔根,1999,《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南京:学林出版社。
- 霍克海默,马克斯,1989,《批判理论:科学及其危机札记》,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 雅思贝尔斯,卡尔,2013,《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刘电光、王前,2009,《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观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第9期。
- 刘文海,1994,《技术异化批判——技术负面效应的人本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韦伯,马克斯,2010,《以学术为业》,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邱泽奇,2018,《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 贝克,乌尔里希,2018,《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arcuse, H.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 Rosa, H. & J. Trejo-Mathys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